

一九六八年德國學生運動始末（上）

郭石城

一、引言

「黃金年代」成長的一代

一九六八年世界各地先後發生學生運動，西方民主國家不必說了，就連社會主義的波蘭、南斯拉夫、捷克以及第三世界的墨西哥、巴西、埃及和土耳其都相繼爆發學潮，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學者們的解釋很多，但是都不夠全面，最有說服力的是英國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他的說法是：

- (1) 六十年代開始各國大學生人數大量增加；
- (2) 一九二五年以前出生和一九五〇年以後出生的年代，在思想和生活經驗上有很大的落差；
- (3) 由於通訊設備及交通工具的進步，各國學運團體容易串聯。例如德國的「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簡稱SDS）與美國的「學生民主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早就有接觸，而德國學運激進份子又轉而成為法國激進份子的典範。

霍布斯邦的分析只是泛指出各國學運的一般情況，事實上，各國學運都有他本身的情況和原因。在進一步分析德國學運形成原因之前，先讓我們看一看德國學運成員的背景。

當年參加德國學運的份子來自社會各階層，大體上是1945年左右出生，1965年前後進入大學的一群。他們大多數來自平民家庭，在「經濟奇蹟」中成長，沒有經歷納粹暴政和戰爭的浩劫，對戰後飢饉和物質匱乏的情況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他們所處的正是霍布斯邦稱的「黃金時代」，生活無憂無慮，而且充滿了機會。德國保守而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者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懷疑的世代」（Skeptische Generation）這本書裡預言：戰後出生的世代有如溫室長大的花朵，絕不會有偏激的行為，他們不會有興趣去結合他人從事政治活動以實現他們的理想。

二、學運發生的原因

（一）牛步的改革

謝爾斯基根據的是五十年代德國的社會和政治情況而做出這樣的判斷，理論上也許沒有錯。他沒有預料的是：六十年代的初期德國社會和文化變遷的迅速，而政府的改革步調趕不上時代，因此知識份子紛紛提出民主改革以及開放社會的要求。六十年代初期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更助長了政治抗議和社會運動。先是一九六一年八月柏林圍牆的興建及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使聯邦德國的統一及外交政策陷入困境；一九六二年發生

「明鏡週刊事件」以及六十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又相繼而來，這一連串事件動搖了人民對聯邦政府的信心。

學運的起始只是「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以下簡稱「學聯」）與西柏林自由大學當局的一連串爭執。一九六一年「學聯」提出一件備忘錄，指出現行大學教育制度仍舊沿襲著一百五十年前馮堡（Wilhelm von Humboldt）時代的制度和精神，已經無法適應現代民主社會的要求，公開主張教授、助教、學生和職員共同治校，主張研究與教學並重，並強調大學負有社會與政治責任。

「學聯」不但發表備忘錄而且也以行動呼籲政府改革教育。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為數約二十萬八千名學生和大學教職員走上街頭。一九六六年「學聯」再度發動一次示威行動，並隨後在各大學校園尤其是以西柏林自由大學為中心與學校當局及教授們展開長期抗爭。

一九六七年六月西柏林大學生為抗議伊朗國王巴巴勒維來訪舉辦大規模示威，自由大學學生昂尼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槍擊致死而造成所謂「昂尼索格事件」之後，學生運動逐漸升高其暴力行動。自由大學天才橫溢的學生領袖杜切克（Rudi Dutschke）呼籲對學運不友善的施普林格出版社（der Springer Verlag）展開鬥爭。1968年4月21日杜切克自己遇刺重傷，在隨後舉行的支援杜切克的示威行動中不斷發生暴力事件。「學聯」本身也直言不諱，必要時將使用暴力。在大學校園，只要是學生們不喜歡的教授，不論他的立場是自由或保守，在上課的時候不斷受到騷擾，甚至於被丟雞蛋或彩帶，嚴重的時候甚至於遭受人身攻擊。校園裡經常發生罷課、系所被學生佔據的事件，至於所謂「抗議集合」（Teach-ins）和「靜坐抗議」（Sit in）更是家常便飯。

（二）要命的「緊急狀態法」

在學運份子要求改革的同時，德國的政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在許多邦的邦議會選舉中選票急速增加。一九六六年基民黨與社民黨組織大聯合內閣，並擬推出「緊急狀態法」（Notstandsgesetze），分散在各處的一般民眾、知識份子以及工會認為大聯合內閣及「緊急狀態法」有掏空民主及議會制度之虞，通訊自由、遷徙自由等基本人權也會受到限制。因此共同組織「國會外反對黨」（Auss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簡稱APO）採取行動加以抵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當選聯邦總理後幾天，他們發動大規模示威和抗議行動，要求更多的民主，並猛烈攻擊基辛格總理當年納粹黨員的身份以及在第三帝國宣傳部工作的經歷。抗議行動持續到一九六七年夏天而且更為極端，已從反權威運動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從要求內部改革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並揚言與第三世界聯合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致力民主解放運動。

（三）世代衝突

為什麼本來只是要求民主與和平的年輕世代會轉變得那個偏激呢？這不是外來的刺激（如越戰和新左派理論）或一樁突發的事件（如昂尼索格事件）或學運領導人物的煽動所能完全解釋，還應從他們的心理與行為上去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飽受戰爭折磨的一代好不容易在戰後困難的環境逐漸恢復正常的生活，在昇平的日子大多數都比較重視物質生活的改善，盡情享樂，對子女疏於管教或管教不當。從五十年代末期開始，

歐美許多富家子弟沈湎於西方次文化，遊手好閒，穿戴奇裝異服，蓄長髮、吸毒、性解放，瘋靡披頭、搖滾和爵士樂，喜歡從事冒險如賽車等行徑。年長的一代及一般社會大眾對青少年放浪形骸的行為極不以為然，馬路報刊更推波助瀾，以頹廢墮落、遊手好閒、社會害蟲、群聚鬧事等字眼形容他們，引起青少年極大的反感，他們內心的惱怒及挫折兼而有之，行為更為叛逆，並反唇相譏，批評上一代保守、落伍。當時歐美各國有不少電影即以世代衝突中青少年的苦悶作為題材（如美國詹姆斯狄恩主演的「養子不教誰之過」）。

（1）「千年霉味」與「離經叛道」的對立

德國世代衝突的情況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德國人本來就很重視紀律和秩序，家庭裡的父母與子女、學校裡的老師與學生、機關裡的長官與部屬、年長者與年幼者之間都嚴守著這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原則。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風氣已經慢慢改變，保守的遺風到處可見，世代衝突的現象經常發生。當時在青年學生之間流傳最廣的形容上一代保守的標語是：「千年臭不可聞的霉味」（Der Muff von tausenden Jahren），而上一代最常使用斥責下一代的字眼則是「離經叛道」。

（2）納粹幽靈糾纏兩代

德國世代衝突的另一個題材是納粹問題的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納粹的首要份子二十餘人雖然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戰勝國在隨後而來的「去納粹化」和「再教育」的政策並沒有落實，數以萬計的納粹幫凶仍逍遙法外。聯邦政府為了社會安定，也由於重建工作亟需人材，因此默許他們在各階層工作，甚至於擔任重要的職務。社會各階層人民因為當年自己或家人或多或少與納粹都有糾纏不

清的瓜葛，也不希望擴大清算。一九六七年心理學家米切利希夫妻（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兩人合著的「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出版，指責德國人民的逃避心理。這本書出版後洛陽紙貴，一版再版，也引起廣泛的討論，年輕一代則因這本書的出版而振振有詞，追究上一代的責任。原來他們心裡長期受到壓抑，當他們在國外旅行或工作的時候，經常得承受其他國家人民的指指點點，他們不願意再擔負戰敗國而且是罪犯後代的恥辱，大聲責問上一代人一九四九年以前，為什麼要附和納粹，甘為鷹犬？為什麼聽任納粹的擺佈而不思反抗？一九四五年以後，為什麼裝聾作啞而不自我檢討？他們譴責的對象包括自己的父母、教授以及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他們指責態度和方式引起上一代人極大的反感，他們的反應大致可歸納為：（a）兩代之間在生活和思想上本來就有許多隔閡，現在年輕一代完全不顧念上一代在納粹統治時期的艱難處境，而且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將那些當年不滿納粹統治者也網織為幫凶。他們責問的口氣有如法院的法官，引起上一代極大的反感；（b）他們擔心這些偏激的言論不但危害到戰後千辛萬苦打造出來的繁榮經濟和穩定的社會，而且會影響到好不容易取得的民主共識和穩定的政治；（c）他們也注意到，學運團體在批評聯邦德國的經濟制度時，所引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攻擊有納粹背景的政治人物的檔案資料很可能都是東德政府提供的。總之，世代衝突造成的社會動盪幅度相當大，久久都無法平復。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